

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 空间分异及机理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杨军辉^{1,2}, 李同昇^{1*}, 徐冬平¹

(1.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127; 2. 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民族文化补偿是以保护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有效传承与创新为目的,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民族文化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而居民认知则是民族文化补偿机制构建的重要依据和实施的关键因素。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依据与村寨民族文化的关系将受访居民分为局内人与局外人,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获取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民族文化补偿认知信息,进而探究居民民族文化补偿认知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异特征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民族旅游村寨中,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完全遵从“核心—边缘”规律;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是文化距离、利益关系、旅游干扰强度和传统价值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结论对民族旅游村寨的民族文化传承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民族旅游村寨;民族文化补偿;居民认知;空间分异;局内人—局外人;西江千户苗寨;贵州

1 引言

民族旅游村寨是以少数民族村寨为空间载体,以少数民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乡村文化旅游地。作为民族旅游村寨发展基础与核心的民族文化,是由本民族历代居民在复杂生境中创造、传承、创新而形成的,其天然产权归属于村寨居民或集体。然而在民族旅游村寨发展过程中,作为民族文化天然产权人的村寨居民或集体却未能在民族旅游业中合理地分享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民族文化几乎成为部分群体获利的免费资本。另外,面对伴随民族旅游而来的异域文化冲击,村寨居民或集体还需承担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重任。权利与义务的分离,致使民族文化“公地悲剧”效应显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世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村寨的和谐与稳定、村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均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在民族旅游村

寨构建民族文化补偿机制。

综观既有文献,国内外民族旅游村寨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础理论(罗永常, 2005; Yang et al, 2013b)、旅游者(黄燕玲等, 2008; Barutçu et al, 2011; Yang et al, 2013a; 王汝辉等, 2013)、村寨居民、资源与开发(张华明等, 2006; 钟洁, 2012; 彭红松等, 2014)、旅游效应(Wang et al, 2010; 李强, 2012)等五大主题。其中,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涉及民族文化补偿问题,仅国内学者田艳(2010)提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应比照生物资源补偿机制构建传统文化补偿制度”,但其对传统文化补偿制度的概念及制度体系构建等具体问题并未深入展开;村寨居民研究方面,目前主要关注社区参与(Archabald et al, 2001; 李强, 2010)、旅游影响感知(Gursoy et al, 2004; 陈志永, 杨桂华等, 2011)和态度(Horn et al, 2002; 李湮等, 2011)等方面,鲜有学者涉及居民民族文化补偿认知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将民族文化补偿概念初

收稿日期:2015-01;修订日期:2015-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MZ053)。

作者简介:杨军辉(1976-),男,陕西眉县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与文化地理研究,E-mail: yjh7821@163.com。

通讯作者:李同昇(1960-),男,陕西岐山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

E-mail: leetang@nwu.edu.cn。

引用格式:杨军辉, 李同昇, 徐冬平. 2015. 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及机理: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34(9): 1167-1178. [Yang J H, Li T S, Xu D P. 2015.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mechanism of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cultural compensation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 the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cas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9): 1167-1178]. DOI: 10.18306/dlkxjz.2015.09.009

步界定为:民族文化补偿是以保护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有效传承与创新为目的,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民族文化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原则下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一种制度。在民族文化的各利益主体中,居民是民族文化的天然产权人和民族文化利益的重要代表,也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际实施人。因而,居民文化补偿认知是民族旅游村寨构建合理民族文化补偿机制的重要依据和民族文化补偿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有必要重点关注。本文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在空间分区基础上获取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民族文化补偿认知信息,定性、定量分析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对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影响机理,以期丰富民族旅游研究理论体系,为民族文化补偿机制的构建与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2 案例区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区概况

西江千户苗寨地处贵州省雷山县,距州府凯里35 km,现有居民1195户5142人(2013年),其中苗族人口占99%,故有“千户苗寨”之称,是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1987年,西江千户苗寨依托其鳞次栉比的吊脚楼、热情奔放的苗族歌舞、绚丽的银饰服装、独特的苗族饮食、神秘而独特的民族节庆、古老的民族风俗、成片的梯田景观等多元苗族文化,开始发展旅游业。但直到2008年“贵州旅游发展大会”在西江成功召开之后,苗寨旅游业才获得长足发展,当年接待游客达77.7万人次(2007年为11万人次)。2009年,雷山县人民政府出资,成立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2011年,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3年,景区共接待游客218.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35亿元^①。由于苗族文化是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核心旅游吸引物,因而以西千户苗寨为案例地探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获取居民文化补偿认知信息,通过局内人—局外人法、统计分析法、条件价值评估法等分析民族旅游村寨居民

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其中,局内人—局外人法是研究者将自己置于局内人或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思考问题(顾朝林等,2008)。由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利益关系、行为方式、信息获取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在看待同一问题时其评判观点势必有所不同。本文将与村寨核心吸引物——民族文化相关的本寨居民个体定义为局内人,即村寨居民;而将与村寨民族文化无直接关系的村寨以外的周边居民个体(不含游客)定义为局外人。通过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民族文化补偿认知差异对比,探究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机理。

深度访谈,也称半结构式访谈,是质性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通常由调查者与受访者围绕既定主题在一定范围内自由交谈,而研究者则从访谈内容中找到特殊话语或线索用于解释被研究者理解世界的意义结构(冯健等,2011)。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获取居民对文化补偿认知形成的原因,为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的机理分析提供依据。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是当前流行的对环境等具有无形效益的公共物品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直接考察受访者在假设性市场里的经济行为,以得到消费者支付意愿(WTP)或者接受赔偿意愿(WTA),从而对商品或服务价值进行计量的一种方法(Bateman et al, 1999; 董雪旺等, 2011)。本文采用CVM计算居民文化补偿最小受偿意愿(WTA)。居民文化补偿最小受偿金额计算公式为:

$$E(WTA) = \sum_{i=1}^n P_i B_i \quad (1)$$

式中: E 为受偿意愿期望值, P_i 为选择该受偿意愿金额人数的分布频率, B_i 为受偿意愿金额, n 为可供选择的受偿意愿金额数。

3 案例区空间分区与数据

3.1 案例区空间分区

依据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文化特征、旅游吸引物、设施空间分布和旅游者空间活动强度,参考陈志永等的研究成果(陈志永,王化伟等,2011),将案例区及周边区域依次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边缘区、外围区等四类区域,各区域特征、范围及居民归属如表1所示,分区结果如图1所示。

^①数据来源:贵州省雷山县西江村村委会、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雷山县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1 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空间分区
Tab.1 Spatial division in the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区域	区域特征	涉及地域	居民归属
核心区	典型黑苗文化 [*] ,为旅游吸引物主要集中区与旅游者主要活动区,旅游高峰期旅游者人数超过当地居民人数	景区古街和游方街等主干道两边、铜鼓表演场(中心广场)和芦笙场周边区域	局内人
过渡区	典型黑苗文化 [*] ,居民主要聚居区,承载旅游景观功能与部分游览功能,具有旅游者与居民双重活动空间特征	南贵、平寨的大部分区域,东引下寨、羊排下寨	局内人
边缘区	典型黑苗文化 [*] ,农业景观为主,旅游者较少涉及,旅游区特征趋于模糊,设施服务对象以当地居民为主	东引上寨、羊排上寨,南贵、平寨的小部分地区	局内人
外围区	非黑苗文化为主,居民生产、生活基本不受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影响,赴苗寨游客在此区域不停留	西江千户苗寨附近区域	局外人

注:^{*}西江苗族属苗族重要支系——黑苗(也称长裙苗),其文化为黑苗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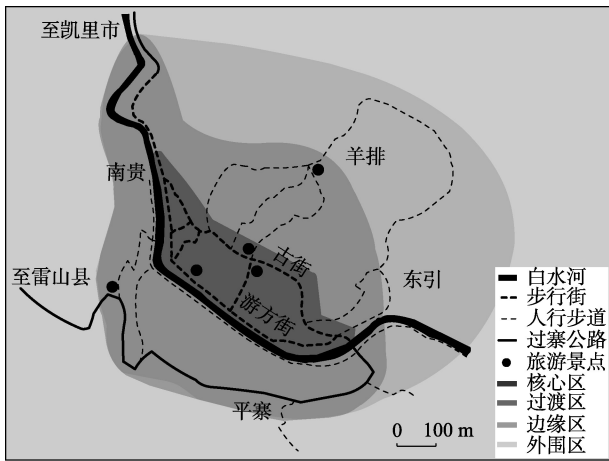


图1 西江千户苗寨空间分区图
Fig.1 Spatial division in the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3.2 数据获取

在参阅相关研究文献与案例区实地调研基础上,结合本次研究目标设计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问卷调查表与深度访谈提纲。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村寨旅游发展认知,包括村寨旅游吸引物认知、旅游发展现状认知和旅游影响认知等;第三部分为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包括民族文化价值认知、民族文化补偿态度认知、民族文化补偿主体认知、民族文化补偿方式认知和民族文化补偿金额认知等五方面内容。其中民族文化价值和补偿态度认知指标的各选项均分为正向认知、负向认知和无认知等三类,并相应赋值为+1、-1和0,以区域居民文化补偿认知平均值作为该区域居民文化补偿的认知度(认知度函数见式(2)),从而实现区域间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结果比较;民族文化补偿金额认知采用支付卡法了解居民最小受偿金额,预设文化补偿金额值为:0、50、100、150、200、300、500、

800、1000、1500、2000、3000等(单位:元/年·人)。深度访谈题目为上述居民民族文化补偿认知原因。

$$CI=\frac{1}{n}\sum_{i=1}^nA_i \tag{2}$$

式中:CI为区域居民文化补偿认知度, A_i 为调查对象文化补偿认知值, n 为样本量。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于2014年7月12-16日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展开,调研期间恰逢苗族重大节日“吃新节”,本寨外出务工人员与居民亲戚齐聚苗寨,因而调研对象囊括苗寨居民与外围居民,符合本次调研需求。本次调研共发放、回收问卷205份,访谈30余人,其中有效问卷201份(涉及局内人151人,局外人50人),有效率为98%。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

3.3 样本人口学特征统计分析

整体样本中(表2),性别比例大致均衡,确保不同性别群体文化补偿认知的表达;苗族居民占81.09%,能够反映样本对苗族文化的正确认知和旅游活动对苗族文化影响的真实感知;样本未包括18岁以下居民群体,确保居民对文化补偿意愿的理性思考与合理表述;从事旅游相关职业与非旅游职业居民比例大致相当,能体现不同利益群体的文化补偿意愿;86.57%居民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能够代表研究区内最广大基层群体的文化补偿意愿;88%以上居民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能够保证问卷质量与文化补偿真实意愿反映;各居住区域样本比例均在25%左右,确保各区域居民文化补偿意愿的有效反映与区域间居民文化补偿认知对比。

4 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

“为什么补?谁补给谁?补多少?如何补?”是

表2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the survey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项目	类别	样本量	百分比/%	项目	类别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110	54.73	民族	苗族	163	81.09
	女	91	45.27		非苗族	38	18.91
年龄*	18~25	67	33.33	月收入/元	≤800	42	20.90
	26~35	65	32.34		801~1499	49	24.38
	36~45	48	23.88		1500~2499	60	29.85
	46~60	19	9.45		2500~3499	23	11.44
	> 60	2	1.00		3500~4999	14	6.96
					5000~7499	8	3.98
职业	旅游相关职业	86	42.79		≥7500	5	2.49
	非旅游相关职业	115	57.21	居住区域	核心区	53	26.3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3	11.44		过渡区	62	30.85
	初中	88	43.78		边缘区	36	17.91
	高中、中专	57	28.36		外围区	50	24.87
	大专、本科	33	16.42				

注：*由于问卷内容较专业，故未涉及18岁以下居民；另外，西江千户苗寨60岁以上居民文盲率较高且存在语言沟通障碍，故此年龄段样本量较少。

民族文化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问题。因而,在此从民族文化价值和居民文化补偿态度(即为什么补)、补偿主客体(即谁补给谁)、补偿标准(即补多少)、补偿方式(即如何补)等5个方面具体探究居民民族文化补偿认知。

4.1 居民民族文化价值认知

民族文化价值认知是文化补偿的基础,影响着其他文化补偿意愿的认知。居民民族文化价值认知调查显示(表3),居民对民族文化价值各指标的认知度均为正值且较高。其中,局内人普遍认为民族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且与自己生活关系较为密切,应该予以有效传承。相较局内人,虽然局外人“民族文化与生活关系”和“民族文化遗产必要性”两指标的认知度均高于边缘区的村寨居民,但总体而言,局外人的民族文化价值认知度低于局内

人相应认知。

从民族文化价值认知度的空间分异角度来看,局内人对民族文化价值3个指标的认知度均存在空间分异。即从核心区到过渡区、边缘区,局内人的民族文化价值认知度呈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民族文化价值认知3个指标中,各区域居民的“民族文化重要性”认知度整体较高,区域间分异较小,而“民族文化与生活关系”和“民族文化遗产必要性”两个指标的认知度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

4.2 居民民族文化补偿态度

居民文化补偿态度是民族文化补偿机制构建与实施的重要依据。居民民族文化补偿态度调查统计(表3),村寨内部各区域居民的民族文化补偿意愿认知度均大于0.9,表明局内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补偿意愿。其中,居民文化补偿意愿认知度虽然从核心区到边缘区呈逐渐递增的空间分异特征,但各区域居民间文化补偿意愿认知度差异却较小,因而其空间分异并不显著;在村寨旅游开发意愿方面,局内人的认知度由核心区到边缘区呈现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且区域间差异较大,表明居民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意愿空间分异显著。综合以上两方面认知度变化特征可以看出,居民文化补偿意愿与旅游开发支持度呈反向关系。

对比局内人、局外人民族文化补偿态度认知度发现,局内人与局外人在“民族文化补偿意愿”和“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意愿”两方面均存在较大分

表3 居民民族文化价值与补偿态度认知度统计
Tab.3 Residents' cognition of cultural value and attitude towards compensation for ethnic culture

类别	指标	局内人			局外人
		核心区	过渡区	边缘区	外围区
民族文化价值认知	民族文化与生活关系	0.962	0.905	0.833	0.90
	民族文化重要性	0.962	0.952	0.944	0.94
	民族文化遗产必要性	0.981	0.871	0.722	0.78
民族文化补偿态度	民族文化补偿意愿	0.925	0.935	0.94	0.76
认知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意愿	0.981	0.854	0.75	0.86

异。其中,局外人的民族文化补偿意愿认知度大幅低于各区域局内人的认知度,但局外人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意愿却高于过渡区与边缘区的局内人认知。访谈获悉,局内人认为民族文化为本民族先辈所创,并由他们传承至今,旅游企业开发利用民族文化当然应该付费,而且民族文化的开发、挖掘、保护也需要经费支持;而局外人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居民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但民族文化却并非归村寨居民独有。当然为了促进民族文化有效传承,旅游企业也应进行适度补偿。

4.3 居民民族文化补偿主客体认知

依据庇古税建议所引出的“谁利用谁补偿、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民族旅游村寨文化补偿的主体应包括地方政府、旅游开发企业、旅游经营户、旅游者等。居民民族文化补偿主体认知调查显示(表4),核心区居民的文化补偿主体认知顺序为“地方政府>旅游开发企业>旅游经营户>旅游者”,与局外人文化补偿主体认知较为一致;而过渡区与边缘区居民的补偿主体认知顺序为“旅游开发企业>地方政府>旅游经营户>旅游者”,且其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企业等补偿主体的认知比例与核心区居民存在较大差异。从整体来看,局内人大都认为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企业应是民族文化补偿的主体,而支持旅游经营户与旅游者作为民族文化补偿主体的人数较少。多数受访居民认为:村寨旅游业绝大部分收入都归政府和企业所有^②,所以应由他们对民族文化进行补偿;而旅游经营户为获取经营权已向相关部门付费,且其收入也是他们辛苦付出所得,因而没必要进行文化补偿;旅游者方面,居民认为

游客进入村寨旅游已经购买了门票,如果再让他们因民族文化补偿而付费,反而会导致游客数量减少,不利于村寨旅游业的发展。综合上述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局内人、局外人均认为民族文化补偿的主体为地方政府与旅游开发企业,而局内人在民族文化补偿主体认知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

依据民族文化的天然产权归属与发展实际,民族文化补偿客体应包括村寨居民个体、村寨集体(或宗族集体)和民族文化贡献者。居民民族文化补偿客体认知调查显示(表4),各区域局内人的文化补偿客体认知顺序均为“村寨集体>居民个体>民族文化贡献者”;而局外人的文化补偿客体认知顺序为“民族文化贡献者>村寨集体>居民个体”,与局内人差异较大。由此表明,在民族文化补偿客体认知方面,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局内人内部却并不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

4.4 居民民族文化补偿标准认知

补偿标准是民族旅游村寨文化补偿的核心,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关系到民族文化补偿的效果与补偿主体的承受能力,进而影响民族旅游村寨与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各区域居民文化补偿标准意愿统计与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300元及以下补偿标准的选择频率总体较低,仅占总样本的13.45%;而1000~3000元之间的补偿标准选择频率较高,占总样本的63.68%,体现出居民对文化补偿标准具有较高的期望值。据CVM法居民文化补偿最小受偿金额(WTA)计算结果显示,核心区、过渡区与边缘区的局内人可接受的最小受偿金额依次为1237.74、1559.68和1306.94元/(年·人),各区域间最小受偿金额差异显著,呈倒“U”型空间变化分异特征。局内人、局外人比较显示,局外人文化补偿最小受偿金额为1352元/(年·人),虽高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局内人受偿意愿,但却低于局内人平均最小受偿金额且差异较小(局内人平均最小受偿金额为1386.42元/(年·人)),表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文化补偿标准认知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4.5 居民民族文化补偿方式认知

传统生态补偿一般采用经济补偿、政策倾斜、产业扶持、税费改革、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补偿形式。结合民族旅游村寨自身特点,民族文化补偿可采用经济补偿、政策倾斜、机会补偿、公共事业投资

表4 居民民族文化补偿主客体认知统计/%
Tab.4 Residents' cognition of providers and recipients of compensation for ethnic culture/%

指标	选项	局内人			局外人
		核心区	过渡区	边缘区	外围区
文化补偿 主体认知	地方政府	79.25	53.23	61.11	58.00
	旅游开发企业	52.83	59.68	72.22	44.00
	旅游经营户	15.09	19.35	8.33	24.00
	旅游者	11.32	6.45	8.33	12.00
文化补偿 客体认知	村寨居民个体	64.15	45.16	52.78	26.00
	村寨集体	66.04	64.52	63.89	44.00
	民族文化贡献者	24.53	25.81	41.67	56.00

注:民族文化补偿主客体认知调查选项为多选题。

②注: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开发企业为国有独资公司。

表5 居民民族文化最小受偿金额分布表

Tab.5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for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支付卡选项/ (元/年·人)	局内人								局外人		总计	
	核心区		过渡区		边缘区		村寨小计		外围区			
	样本量	频率/%	样本量	频率/%	样本量	频率/%	样本量	频率/%	样本量	频率/%	样本量	频率/%
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5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2	4.00	2	1.00
100	0	0.00	1	1.61	0	0.00	1	0.66	1	2.00	2	1.00
150	0	0.00	0	0.00	1	2.78	1	0.66	0	0.00	1	0.50
200	2	3.77	2	3.23	1	2.78	5	3.31	4	8.00	9	4.48
300	3	5.66	4	6.45	5	13.89	12	7.95	1	2.00	13	6.47
500	12	22.64	5	8.06	3	8.33	20	13.25	5	10.00	25	12.44
800	6	11.32	5	8.06	4	11.11	15	9.93	6	12.00	21	10.45
1000	13	24.53	12	19.35	7	19.44	32	21.19	10	20.00	42	20.90
1500	5	9.43	9	14.52	5	13.89	19	12.58	4	8.00	23	11.44
2000	3	5.66	9	14.52	4	11.11	16	10.60	8	16.00	24	11.94
3000	9	16.98	15	24.19	6	16.67	30	19.87	9	18.00	39	19.40
WTA	1237.74		1559.68		1306.94		1386.42		1352.00		1377.86	

补偿等形式。居民民族文化补偿方式调查显示(表6),局内人最偏好的补偿形式为现金与机会补偿,而公共事业投资补偿形式受欢迎程度最低;从空间角度来看,核心区与过渡区居民的补偿形式认知顺序为“现金>机会>政策倾斜>公共事业投资”,边缘区居民的补偿形式认知顺序为“现金>政策倾斜>机会>公共事业投资”,局内人之间文化补偿形式认知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局内人不同,局外人最偏好的文化补偿形式为机会和政策,其各选项认知顺序为“机会>政策倾斜>公共事业投资>现金”,与局内人相应认知存在较大分异。

由于民族旅游村寨内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所提供的民族文化旅游服务及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等存在异质性,村寨内部采用同一补偿标准可能会出现文化补偿的无效率问题。调查显示(表6),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局内人对居民间同一补偿标准的支持率高于差异补偿标准,而局外人则更倾向于居民间采用同一补偿标准;从空间分布角度来看,局内人同一补偿标准的支持率由核心区向过渡区、边缘区呈现小幅下降趋势,而差异补偿标准的支持率则正好相反,表明局内人对居民间补偿标准差异认知存在非显著空间分异特征。

由于民族旅游村寨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发展目标与经济效益有所不同,补偿主体所具有的补偿能力也会存在差异,因而民族文化补偿标准应随时间而变动。调查显示(表6),补偿标准随时间推移而“阶段性增加”和“依破坏情况而定”是局内人与局

表6 居民民族文化补偿方式认知统计/%

Tab.6 Residents' cognition of modes of compensation for ethnic culture /%

认知指标	认知选项	局内人			局外人
		核心区	过渡区	边缘区	外围区
补偿形式 认知	现金	69.81	61.29	61.11	18.00
	机会	67.92	54.84	44.44	50.00
	政策倾斜	43.40	40.32	58.33	42.00
	公共事业投资	30.19	27.42	16.67	36.00
居民间差异 补偿认知	同一标准	52.83	51.61	41.67	74.00
	差异标准	47.17	48.39	58.33	26.00
补偿标准时 间变动认知	阶段性增加	47.17	51.61	33.33	38.00
	固定标准	15.09	19.35	25.00	28.00
	依破坏情况而定	37.74	29.03	41.67	34.00

外人的主流认知;从空间分异角度看,核心区与过渡区居民的文化补偿标准随时间变动认知顺序均为“阶段性增加>依破坏情况而定>固定标准”,边缘区居民的认知顺序为“依破坏情况而定>阶段性增加>固定标准”。由此表明,局内人在民族文化补偿标准随时间变动认知方面虽略有差异,但并不存在显著空间分异特征。

5 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

5.1 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5.1.1 文化距离

民族文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其价值的认

知却受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价值需要及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单就认知主体与民族文化之间关系而言,如果认知主体与某一民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认知主体则因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全面、深度理解而形成较高的价值认知,但也存在因与民族文化距离过近而对其价值产生熟视无睹的“近视效应”,形成较低的价值认知;相反,如果认知主体与某一民族文化之间距离较远,则存在因对民族文化价值的片面或肤浅理解而形成较低的文化价值认知。但较远的文化距离却有利于认知主体通过民族文化与其他多元文化之间的比较而客观的审视该民族文化价值。因而,文化距离对民族文化价值认知具有重要影响。

在民族旅游村寨,局内人是村寨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且民族文化已渗透到局内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局内人与村寨民族文化具有较近的文化距离。局外人则大都处于村寨民族文化圈以外,与民族文化距离较远。受文化距离影响,局外人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知度总体低于局内人相应认知;而在局内人内部,不同区域居民与民族文化的距离也存在差异。其中,处于核心区的局内人,由于长期与蕴含其他外部文化的旅游者群体高强度地接触,自身已兼具本民族文化与外部文化,因而其与本民族文化的距离介于局外人与其他局内人之间。由于核心区的局内人与本民族文化距离适中,可以同时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审视本民族文化,因而其民族文化价值认知相对较为全面、客观。而处于其他区域的局内人,则受“近视效应”影响,其民族文化价值认知显著低于核心区局内人认知,甚至低于局外人相应认知。如民族文化价值认知类别中的“民族文化遗产必要性”认知选项,处于边缘区的局内人其认知度不仅显著低于核心区局内人的认知,也低于局外人相应认知。

5.1.2 利益关系

由于民族旅游村寨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吸引物的旅游经济体,因而民族旅游村寨兼具文化性和经济性。与此相应,民族旅游村寨涉及群体也分属村寨民族文化圈和村寨旅游经济圈。其中,村寨民族文化圈由具有相同民族文化的群体构成,主要涉及大部分村寨居民。他们是民族文化的天然产权人和文化传承、发展与保护的责任人,面对民族文化被利用、被破坏,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权益维护诉求,因而与村寨旅游业之间形成民族文化利益关系;而村寨旅游经济圈则是由具有共同旅游经济利

益追求的群体构成,主要涉及旅游开发企业、地方政府、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旅游经营户等群体,他们与村寨旅游业之间存在共生或寄生的经济利益关系(图2)。

在民族旅游村寨中,局内人与村寨旅游业之间均存在民族文化利益关系,但少数局内人与村寨旅游业之间除具有民族文化利益关系以外,还存在着旅游经济利益关系。如位于核心区的局内人,受居住区位、发展机会等方面因素影响,其村寨旅游开发参与度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居民,与村寨旅游业之间具有较强的共生经济关系。因而,与村寨旅游业之间具有单一民族文化利益关系的局内人往往形成较高的民族文化价值认知、民族文化补偿意愿、受偿标准及较低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支持率;而同时兼具民族文化利益关系与旅游经济利益关系的局内人虽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价值认知,但他们为了获取旅游经济利益而愿意让渡部分民族文化利益,从而形成较高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支持率和较低的民族文化补偿意愿和受偿标准。如核心区的局内人,其民族文化价值认知度与文化旅游开发支持率均高于过渡区与边缘区的局内人,但其民族文化补偿意愿与补偿标准却低于其他两个区域的局内人。位于民族旅游村寨以外的局外人,与村寨旅游业之间基本不存在民族文化利益关系和旅游经济利益关系,因而局外人对民族文化价值、民族文化补偿意愿和补偿标准等方面认知均低于局内人相应认知。

5.1.3 旅游干扰强度

由于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服务设施在旅游地的空间布局存在差异,因而旅游者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呈现出空间分异性。在民族旅游村寨中,旅游者活动影响对村寨居民的干扰强度由核心区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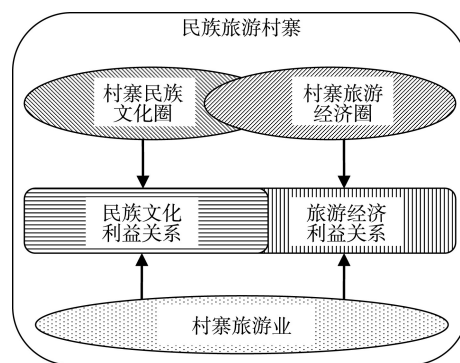


图2 民族旅游村寨利益关系图

Fig.2 Interest relationship in ethnic tourism

过渡区、边缘区呈逐步递减分布规律。如仅考虑旅游干扰这一个因素,受旅游干扰强度最大的区域,居民往往对旅游开发持有较低的支持度,但却具有强烈的旅游补偿诉求;旅游干扰强度适中的区域,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度应高于旅游干扰强度最大区域,并相应具有适度的旅游补偿诉求;而旅游干扰强度较低的区域,居民则拥有较低的旅游补偿诉求并对旅游开发持无所谓的态度。因而在民族旅游村寨中,单纯出于旅游干扰强度角度考虑,居民旅游开发支持度在空间上应呈倒“U”型分布,而补偿态度与补偿标准认知则应由核心区向外围区呈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

在民族旅游村寨中,核心区居民受旅游干扰强度最大且具有最高的民族文化价值认知,理应形成较低的旅游开发支持度和最高的补偿意愿与补偿标准。但由于与村寨旅游业之间存在的较强经济共生关系,本区居民反而形成最高的旅游开发支持度和最低的文化补偿意愿与补偿标准认知;而过渡区居民受旅游干扰的强度介于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因而具有适中的旅游开发支持度与补偿意愿。但现实中的旅游零收益和较强旅游干扰导致他们形成最高的补偿标准认知;边缘区居民受旅游干扰强度最低但也无旅游收益,因而具有最低的旅游开发支持度。并在旅游补偿方面,虽具有强烈的补偿意愿但却持有较低的补偿标准期望。综合上述分析表明,旅游干扰强度对过渡区与边缘区居民的旅游开发支持度、补偿意愿和补偿标准等认知具有显著影响。

5.1.4 传统价值观

传统价值观是历史时期人们对客观对象的意义或价值的认知,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法律、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中国传统价值观历经几千年发展并传承至今,已广泛、深入地渗透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影响或主导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价值评价、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杨蔚, 2001)。

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入性,致使局内人与局外人对需要用价值观进行评判的民族文化补偿认知选项并未形成显著的空间差异。如在民族旅游村寨,虽然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所提供的民族文化旅游服务及所产生经济价值存在现实的异质性,但多数居民却认为居民间应采用“同一文化补偿标准”。原因在于,同一文化补偿

标准有利于居民间的和谐与村寨的稳定,其实质是中国传统人生处世态度“以和为贵、适可而止”的价值观(王岩, 2002)对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的体现;而民族文化补偿客体认知中的重集体而轻个人、补偿形式认知中的重有形(如现金)而轻无形(如政策)等,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群体取向”特征及延伸的“他人取向”消费行为特征(潘煜, 2009)的一种体现。

5.2 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的机理关系

综上分析,构建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影响机理关系(表7)。该机理关系涉及局内人与局外人对民族文化价值、补偿态度、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5个方面认知。

在民族文化价值认知方面,居民认知主要受文化距离与经济利益关系两因素影响。其中,核心区居民因适中的民族文化距离和强经济利益关系而形成高文化价值认知,过渡区居民因较近的民族文化距离和弱经济利益关系而形成中文化价值认知,边缘区居民因较近的民族文化距离和无经济利益关系而形成低文化价值认知,而外围区居民与民族文化距离较远且无经济利益关系,因而形成低文化价值认知。

民族文化补偿态度方面,居民认知主要受利益关系和旅游干扰强度两因素影响。其中,核心区居民与旅游村寨存在强经济利益关系,但同时也具有强文化利益关系且受高度旅游干扰,因而形成高旅游开发支持度和中民族文化补偿意愿;过渡区居民与旅游村寨存在弱经济利益关系,但却具有强文化利益关系并受到中度旅游干扰,因而形成中旅游开发支持度和强民族文化补偿意愿;边缘区居民与旅游村寨存在强文化利益关系,但却无经济利益关系且受低度旅游干扰,因而形成较低的旅游开发支持度和强民族文化补偿意愿;外围区居民则与旅游村寨不存在利益关系且不受旅游干扰,因而其形成中旅游开发支持度和低民族文化补偿意愿认知。

民族文化补偿主客体方面,居民认知主要受利益关系和传统价值观两因素影响。其中,局内人与民族文化补偿之间均存在强利益关系(文化补偿的受益者),但受传统价值观影响,故形成先集体而后个体的补偿客体认知;局外人也受传统价值观影响,但由于与民族文化补偿无利益关系,故认为补偿客体应以民族文化贡献者和集体为主。

民族文化补偿标准方面,居民认知主要受利益

表7 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影响机理关系

Tab.7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compensation for ethnic culture					
认知选项		局内人			局外人
		核心区	过渡区	边缘区	外围区
文化价值 认知	影响因素	适中文化距离;强经济利益关系	近文化距离;弱经济利益关系	近文化距离;无经济利益关系	远文化距离;无经济利益关系
	认知结论	高文化价值认知	中文化价值认知	低文化价值认知	低文化价值认知
补偿态度 认知	影响因素	强经济利益关系;强文化利益关系;高度旅游干扰	弱经济利益关系;强文化利益关系;中度旅游干扰	无经济利益关系;强文化利益关系;低度旅游干扰	无经济、文化利益关系;无旅游干扰
	认知结论	高旅游开发支持;中补偿意愿	中旅游开发支持;强补偿意愿	低旅游开发支持;强补偿意愿	中旅游开发支持;低补偿意愿
补偿主客 体认知	影响因素	强利益关系;传统价值观	强利益关系;传统价值观	强利益关系;传统价值观	无经济、文化利益关系;传统价值观
	认知结论	补偿客体为集体与个体	补偿客体为集体与个体	补偿客体为集体与个体	补偿客体为文化贡献者与集体
补偿标准 认知	影响因素	强经济利益关系;强文化利益关系;高度旅游干扰	弱经济利益关系;强文化利益关系;中度旅游干扰	无经济利益关系;强文化利益关系;低度旅游干扰	无经济、文化利益关系;无旅游干扰
	认知结论	低补偿标准	高补偿标准	中补偿标准	中补偿标准
补偿方式 认知	影响因素	传统价值观	传统价值观	传统价值观	传统价值观;无经济、文化利益关系
	认知结论	补偿重有形(现金)轻无形(政策);居民间同一标准	补偿重有形(现金)轻无形(政策);居民间同一标准	补偿重有形(现金)轻无形(政策);居民间差异标准	补偿重无形(政策)轻有形(现金);居民间同一标准

关系和旅游干扰强度两因素影响。其中,核心区居民虽与旅游村寨具有强文化利益关系且受高度旅游干扰,但与村寨之间的强经济利益关系使其形成低民族文化补偿标准认知;过渡区居民与旅游村寨具有强文化利益关系和弱经济利益关系,且受中度旅游干扰,因而形成高民族文化补偿标准认知;边缘区居民与旅游村寨存在强文化利益关系,但却不存在经济利益关系且受旅游干扰较小,因而形成中民族文化补偿标准认知;外围区居民与旅游村寨不存在利益关系且不受旅游干扰,因而形成中民族文化补偿标准认知。

民族文化补偿方式方面,居民认知主要受传统价值观因素影响。其中,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局内人均形成重有形(现金)而轻无形(政策)的补偿形式认知,半数以上局内人认为居民间应采用同一补偿标准;局外人也受传统价值观影响,故形成居民间应采用同一补偿标准的主流认知。但其与旅游村寨、文化补偿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的现实,也促使其形成较为合理的重无形(政策)而轻有形(现金)的补偿形式认知。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1) 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

的。由居民文化补偿多方面认知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局内人内部还是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各区域居民对民族文化补偿诸多方面认知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认识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有利于从居民角度审视村寨旅游业发展问题,可为制定“以人为本”的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2) 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并非完全遵从“核心—边缘”规律。研究表明,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并非完全遵从“核心—边缘”规律。其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①局内民族文化价值认知度由核心区到边缘区呈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且整体高于局外人相应认知;②局内人民族文化补偿意愿强烈并高于局外人,其内部虽存在由核心区到边缘区逐步递增的空间分异特征,但内部分异并不显著;③局内人对民族文化补偿主体认知顺序虽存在空间分异,但主要补偿主体均为旅游开发企业与地方政府,且与局外人认知基本一致。而局内人文化补偿客体认知不存在空间分异特征,但与局外人存在较大分异;④局内人民族文化补偿标准认知由核心区到边缘区呈倒“U”型空间分异特征,但局内人平均补偿标准认知与局外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⑤局内人对民族文化补偿形式和居民间同一补偿标准的认知不存在

显著空间分异,但却与局外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3) 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是文化距离、利益关系、旅游干扰强度和传统价值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分析表明,文化距离是居民文化价值认知空间分异的本质原因;利益关系(包括民族文化利益关系和旅游经济利益关系)和旅游干扰强度则对居民旅游开发支持度、补偿意愿、补偿标准等认知的空间分异形成具有深度影响;而传统价值观是居民对文化补偿客体、补偿形式、居民间差异补偿等方面认知空间分异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因此,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是文化距离、利益关系、旅游干扰强度和传统价值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6.2 民族旅游村寨文化补偿建议

(1) 民族旅游村寨应积极实施文化补偿。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基础与核心,更是世界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要有效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而调查也显示,居民对民族文化的被利用与被破坏具有强烈的文化补偿意愿。因此,为了确保民族文化与村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及村寨的和谐稳定,民族旅游村寨应积极实施文化补偿。

(2) 明确民族文化补偿主客体。民族文化免费用于村寨旅游开发,对旅游开发企业、地方政府和旅游经营户等群体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其中,旅游开发企业与地方政府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最大受益群体。依据“受益者补偿”原则,旅游开发企业和地方政府理应肩负最主要的民族文化补偿责任。另外,由于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村寨也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福特基金会、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等文化保护组织或基金会申请民族文化保护资助;在民族文化补偿客体方面,村寨集体与个体是民族文化的天然产权人、依附主体和传承、保护责任人,理应成为民族文化补偿的主要客体。另外,民族文化补偿时也应考虑民族文化贡献者(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人员或部门)的付出,并予以适度补偿。

(3) 民族文化补偿标准应结合居民受偿意愿与村寨旅游发展实际。补偿标准是民族文化补偿实施的关键,因而在制定民族文化补偿标准时既要关注受偿主体利益也要兼顾村寨旅游业发展实际。具体可采用科学方法^③测定居民最小文化受偿意愿和补偿主体最大补偿意愿,然后通过补偿主、客体

间多次博弈而确定合理的民族文化补偿标准。同时,考虑村寨旅游业发展实际,可在不同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补偿方式,如起步阶段可以政策、机会补偿为主,而成长、成熟期则可综合采用现金、机会、公共事业投资等多种补偿方式。

(4) 居民之间民族文化补偿标准应存在差异,但不宜过大。由于民族旅游村寨中不同文化景观具有不同经济价值且存在同一居民承载多项民族文化等事实,如在居民之间实施同一文化补偿标准,势必会产生文化补偿无效率问题,因而居民之间应执行差异文化补偿标准。但居民间文化补偿标准差异过大将不利于村寨的和谐与稳定,且半数以上居民在调查中支持居民间采用“同一补偿标准”。所以在制定文化补偿标准时,居民间差异不宜过大。

致谢: 本论文调研得到贵州省雷山县西江村党总支杨正杰副书记、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杨龙副经理、广西师范大学黄丽晓、陈美荣、韦嘉浠、石志能等四名同学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陈志永, 王化伟, 毛进. 2011. 民族村寨居民与旅游经济增权感知空间分异[J]. 商业研究, (3): 133-138. [Chen Z Y, Wang H W, Mao J. 2011. Minzu cunzhai jumin yu lvyou jingji zengquan ganzhi kongjian fenyi[J]. Commercial Research, (3): 133-138.]
- 陈志永, 杨桂华, 陈继军, 等. 2011.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 热带地理, 31(2): 216-222. [Chen Z Y, Yang G H, Chen J J, et al. 2011.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tourism empowerment perception of ethnic village community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in Guizhou[J]. Tropical Geography, 31(2): 216-222.]
- 董雪旺, 张捷, 刘传华, 等. 2011. 条件价值法中的偏差分析及信度和效度检验: 以九寨沟游憩价值评估为例[J]. 地理学报, 66(2): 267-278. [Dong X W, Zhang J, Liu C H, et al. 2011. Bias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a case study of assessment of Jiuzhaigou's recreational valu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2): 267-278.]
- 冯健, 吴芳芳. 2011. 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J]. 地理研究, 30(11): 1956-1969. [Feng J, Wu F F. 2011.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③如:居民民族文化最小受偿意愿可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定,补偿主体最大补偿意愿可采用“投标博弈法”或“直接提问法”测定。

- urban socio- 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11): 1956-1969.]
- 顾朝林, 于涛方, 李平, 等. 2008. 人文地理学流派[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Gu C L, Yu T F, Li P, et al. 2008. *Renwen dilixue liupai*[M]. Beijing, China: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黄燕玲, 黄震方. 2008. 农业旅游地游客感知结构模型与应用: 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7(6): 1455-1465. [Huang Y L, Huang Z F. 2008. A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ourist perception for agri-tourism destinations: taking 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as an exampl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7(6): 1455-1465.]
- 李强. 2010.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自主和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 以云南泸沽湖与青海小庄村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31(2): 106-112. [Li Q. 2010. Community autonomy 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ic culture in ethic villages tourism: evidence from Lugu Lake in Yunnan and small village in Qinghai[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31(2): 106-112.]
- 李强. 2012. 新农民: 民族村寨旅游对农民的影响研究: 以云南曼听村与贵州西江村为例[D]. 兰州: 兰州大学. [Li Q. 2012. The new peasantries: study of impact ethnic rural tourism on peasants: case of Manting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nd Xijiang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 [D]. Lanzhou,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 李涇, 李雪松, 郭雷. 2011. 西双版纳傣族园村民的旅游态度演变和利益认知程度研究[J]. *江苏商论*, (8): 120-122. [Li Y, Li X S, Guo L. 2011. Xishuangbanna daizuyuan cunmin de lvyou taidu yanbian he liyi renzhi chengdu yanjiu[J]. *Jiangsu Commercial Forum*, (8): 120-122.]
- 罗永常. 2005. 试论民族村寨旅游的特征与开发原则[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3(6): 60-62. [Luo Y C. 2005. A analysis on tourism in ethnic villages[J]. *Journal of Southeast Guizhou National Teacher's College*, 23(6): 60-62.]
- 潘煜. 2009. 中国传统价值观与顾客感知价值对中国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7(3): 53-61. [Pan Y. 2009. The influenc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ustomer perceived values on Chinese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7(3): 53-61.]
- 彭红松, 陆林, 路幸福, 等. 2014. 基于旅游客流的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优化: 以泸沽湖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33(3): 422-431. [Peng H S, Lu L, Lu X F, et al. 2014.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optimization of cross-border tourism area based on tourist flow: a case study in Lugu Lak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3(3): 422-431.]
- 田艳. 2010.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利益补偿制度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4): 181-187. [Tian Y. 2010. On the profits compensation system during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J]. *Study of Ethnics in Guangxi*, (4): 181-187.]
- 王汝辉, 张琼, 赵吉明. 2013.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民族村寨游客偏好研究: 以丹巴县甲居藏寨游客为例[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0(2): 51-57. [Wang R H, Zhang Q, Zhao J M. 2013. On the tourists' preference of ethnic villages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J].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0(2): 51-57.]
- 王岩. 2002. 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比较研究: 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取向[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39(5): 103-109. [Wang Y. 200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agmat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9(5): 103-109.]
- 杨蔚. 2001. 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性探析[J]. *理论学习与探索*, (1): 70-73. [Yang W. 2001. Zhongguo chuantong jiazhi guan yu chuantong siwei fangshi xiangguanxing tanxi[J]. *Theory Studying and Exploration*, (1): 70-73.]
- 张华明, 滕健. 2006.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CCTV模式: 以西双版纳"中缅第一寨"勐景来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6(3): 97-103. [Zhang H M, Teng J. 2006. CCTV: a mo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 taking Mengjinglai Village of Xishuangbanna an example[J]. *Study of Ethnics in Guizhou*, 26(3): 97-103.]
- 钟洁. 2012. 基于游憩体验质量的民族村寨旅游产品优化研究: 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四川甲居藏寨为例[J]. *旅游学刊*, 27(8): 95-103. [Zhong J. 2012.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ourism products in ethnic villages based on recreational experience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Dai Park, Xishuangbanna and Jiaju Tibetan Village, Sichuan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7(8): 95-103.]
- Archabald K, Naughton- Treves L. 2001. Tourism revenue-sharing around national parks in Western Uganda: early efforts to identify and reward local communities[J].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8(2): 135-149.
- Barutcu S, Doğan H, Üngüren E. 2011. Tourists' percep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shopping in alanya reg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4: 1049-1059.
- Bateman I J, Willis K G. 1999. Valuing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in the US, EU,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rsoy D, Rutherford D G. 2004. Hos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an improved structural mode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1(3): 495-516.
- Horn C, Simmons D. 2002. Community adaptation to tourism: comparisons between Rotorua and Kaikoura, New Zealand[J]. *Tourism Management*, 23(2): 133-143.
- Wang H, Yang Z P, Chen L, et al. 2010. Minor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 case of Kanas Tuva villages in Xinjiang,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31(6): 759-764.
- Yang J J, Ryan C, Zhang L Y. 2013a. Ethnic minority tourism in China-Han perspectives of Tuva figures in a landscape [J]. *Tourism Management*, 36: 45-56.
- Yang J J, Ryan C, Zhang L Y. 2013b. Social conflict in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35: 82-9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mechanism of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cultural compensation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 the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case

YANG Junhui^{1,2}, LI Tongsheng^{1*}, XU Dongping¹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i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at takes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thnic culture as the purpose, which adjusts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s of ethnic culture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by mean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market.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ke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Taking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as a case, this study divides the residents into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nd investigates their cognition towards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does exist in the ethnic tourism villag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are not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re-periphery relationship.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insiders' cognition towards the cultural valu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re-periphery relationship, but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willingness to accept for the compensation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insiders' cognition towards compensation standard shows an inverted "U" shape.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al distance", interest relationship, tourism interference intensity, and traditional values. "Cultural distance" is the essential reason of residents' cultural value cognitio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for the compensation is affected by interest relationship and tourism disturbance. Compensation recipients and forms a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values. In order to prompt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cul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ethnic tourism village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cultural compensation,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providers and recipients of the compensation, decide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s based o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apply different compensation standards to the residents.

Key words: ethnic tourism village; ethnic cultural compensation; residents' cogniti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sider & outsider;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Guizhou